



红旗漫卷照雄关



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孙女、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(左三)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与遵义市老城小学“小小红色宣讲员”进行交流。

记者 张磊 摄

祖孙接力红色守望

——访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

■记者 李杨 王音 翟玉静
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记者 吴杰

群山叠翠,碧波汤汤。9月的遵义,浸润着满城红色风骨。

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,一栋青砖灰瓦、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静静矗立,这里便是遵义会议会址。

站在小楼前,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的心情无比澎湃。作为老红军、娄山关战斗亲历者、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的孙女,这里的一草一木她早已熟记于心。

“1935年,中国革命深陷绝境、前路茫茫,正是在这栋寻常小楼里,一场改变命运的会议郑重召开,于迷雾之中,为万里长征的胜利突围、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锚定了航向。这段历史淬炼出的‘坚定信念、坚持真理、独立自主、团结统一’的遵义会议精神,至今仍是指引人们前行的不灭灯塔。”孔霞介绍。

与这栋小楼相依相伴的,还有一棵刺槐树。它呈天然的“V”字造型,被遵义人亲切地唤作“胜利树”。“这是纪念馆里唯一‘活着’的文物,它不仅见证了红军从谷底走向光明的伟大转折,也见证了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。未来,它还将继续见证我们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,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照进现实。”孔霞动情地说。

不远处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内光影温沉,2100余件珍贵文物有序展陈。泛黄的战地手稿、锈迹斑驳的枪械弹药、褶皱磨损的红军衣物……沿着参观路线前行,那段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被逐渐“唤醒”。

“那时候经费拮据、人员短缺、资料匮乏,爷爷翻山越岭、走村串户,挨家寻访红军亲历者、当地老乡亲,一点点核对史实、一件件征集文物。”孔霞回忆起祖父筹建纪念馆的往事,字字句句皆道出当年的筚路蓝缕。

一页页家笔墨,半部黔地长征,一纸民间手稿,照见万古初心。在众多展陈物品中,孔霞常向游客提起

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——《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军的诗歌稿本》。这位贵州侗族的农民歌师,在账本后写下诗歌,记录红军帮百姓修路、救济贫苦群众的感人瞬间,还冒险收留负伤红军连长并结为兄弟。字里行间,满是对红军的敬仰与追随,生动印证了红军在当地百姓心中如山般的声望。

文物无言,历史有声;岁月流转,精神永存。遵义会议陈列馆之内,一场温暖而动人的偶遇,让红色传承的画面愈发鲜活明亮。

几名来自遵义市老城小学的“小小红色宣讲员”正认真地向游客讲述红色故事,看到孔霞到来,孩子们十分兴奋。

“孔老师,我们讲解长征历史的时候,怎样才能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难?”“我们年纪小,怎样才能把遵义会议的精神讲得更有力?”

一声声真诚发问,是少年对红色信仰的敬畏,是新生代对使命传承的求索。

望着孩子们热切的目光,孔霞俯身温柔叮嘱,言语中充满期许:“讲好故事先要读懂故事,把文物背后有血有肉的真实细节讲出来,用真心去传递,听众自然会被打动。”

凤凰山南麓,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静卧于群山怀抱,清风穿林发出簌簌声响,似是英烈在耳畔低语。顺着苍翠石阶缓步上行,红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、直指苍穹。

“每当走上这层层阶梯,我的内心都极为触动。一步一阶,都是向英烈致敬。”孔霞望向肃穆的纪念碑,语气真挚而庄重。

在陵园广场左侧,红军卫生员龙思泉铜像静静伫立。1935年,年仅18岁的龙思泉为救治罹患伤寒的贫苦百姓,惨遭地方乡丁杀害。感念他舍身济世的恩德,当地百姓冒着生命之危安葬烈士,世代祭拜并尊称他为“红军菩萨”。

“红军自己缺医少药,却仍拼尽全力解救穷苦百姓。”孔霞说,“这份军民鱼水情,老百姓记了一代又一代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?这一尊铜像,就是最庄

重,使党内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重新回到集体讨论和民主集中制轨道,党内政治生活由此开始出现重要变化。

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,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,正式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会师的既定计划,转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再次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明确:关于大的军事行动方针,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。重大军事决策权进一步回到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。

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,既为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,也使红军避开敌军重兵,获得难得的休整时间。

1935年1月,中央红军占领遵义。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遵义会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会议,与会者围绕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问题展开充分讨论。不同意见都可以表达,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而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,中国共产党开始依靠自



卢锡永、冉戊英夫妇驾驶小船在乌江上打捞垃圾漂浮物,保护乌江的生态环境。

记者 张磊 摄



中小学生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。

记者 张磊 摄



重的答案。”

陵园内,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之墓也安放于此。邓萍是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军事将领,1935年攻打遵义城侦察敌情时,不幸遭敌人冷枪击中牺牲,年仅27岁。新中国成立后,孔宪权参与邓萍烈士遗骸搜寻工作,众人不忍动用机械工具,徒手刨土搜寻,最终仅寻得烈士头骨,还有纽扣、皮带扣等零星遗物留作纪念。

九十余载岁月更迭,九十余载山河巨变。在孔霞看来,新时代的红色传承,既要守得住根脉,也要跟得上时代。让静态的文物“开口说话”,让厚重的历史“鲜活出圈”,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浸润新时代青年心灵。

“展陈手段在更新,宣讲形式在迭代,但红军的信仰底色从未动摇。”孔霞说,硝烟战火早已远去,当代人同样要翻越属于自己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。

从孔宪权护史建馆,到孔霞深耕红色宣讲,祖孙两代人,坚守同一片红色热土,践行同一种赤诚信仰。

山河锦绣,初心滚烫。伟大的长征精神,终将在一代代守望与传承中,照亮每一段崭新的奋进征程。

一江碧水 见证天险蝶变

■记者 翟玉静 王音 李杨
瓮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明清 杨青

从遵义出发三个多小时,汽车顺着山势一路盘旋而行。记者赶到黔南州瓮安县珠藏镇丰岩村双池渡口,一江碧水豁然铺开。

江面上,一艘清漂船缓缓移动。只见一个人站在船头,探出一柄长钩,从水里挑起几个塑料瓶,回手甩进船舱;另一个人则在船尾掌舵。

“那是卢锡永和冉戊英。”同行的瓮安县水务局工作人员指向江面介绍,“两口子是县里的义务清漂员,在这江边待了40年。”

这时,船头的人回过头,嗓门敞亮:“来嘛,上船说!”记者上船,马达响起。两岸岩壁层叠,一道瀑布从山腰挂下来。

“以前江上没桥,赶集、上学、看病都要坐摆渡船。我做渡工,专门送人过江。”卢锡永说,后来桥修起来了,坐船的人少了,渡口慢慢安静下来。

渡工不做了,两口子却一直守着这条江。“我们家就在江边嘛,就像自家的院坝一样。谁不喜欢家里干干净净?”卢锡永说。

这一干就是40年。1986年,两人结婚,家安在乌江边。从那时起,他们看到岸边有垃圾就捡,水里漂来杂物就划船去捞。没人安排,也没有报酬。

后来村里搞网箱养殖,收入增加,水质却变差。“最差的时候,窗子都不敢开。”卢锡永说。2017年清理网箱,夫妻俩成了村里第一批拆网箱的人。

如今,卢锡永开的是今年4月政府部门新换的清漂船。卢锡永说:“大船清得多、跑得远,可临近岸边的区域还得靠小船贴着岸边收垃圾。岸边有垃圾桶,打捞上来的垃圾集中后由清运车运走。如今,水泥路一直修到渡口,清漂、收集、转运已经连成一条线。”

忙过一阵,冉戊英空出手来,又举起手机转着方向拍着两岸的景色。露营的帐篷、钓鱼的人……她笑着说要发到网上,让外面的人都看看。

“水好了,游客就多了。”冉戊英说。瓮安县水务局干部卢锡江补充道:“经过多年下大力气治理,如今乌江瓮安段干流水质已经稳定达到Ⅲ类标准。”

中午时分,别了卢家院落,记者驾车沿乌江一路向下游行驶,来到江界河渡口。

站在江边,第一感觉是静。构皮滩水库蓄水后,昔日湍急的乌江已趋平缓。水已平,山未改,对岸绝壁上,“乌江天险”四个红字依然醒目。

江风把思绪吹回了90多年前。

1935年1月,猴场会议决定渡过乌江,向遵义进发。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奉命抢渡江界河渡口。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晏江婷说:“渡船被毁,江急岸陡,敌军据险,红军组织泅渡,扎制竹筏,冒着火力强渡乌江,随后架设浮桥,掩护大部队过江,打开了向遵义挺进的通道。”

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后来在《渡乌江》中写下眼前所见:“碧绿的江水,墨黑的石山,所谓天险乌江真是名不虚传!”14年后的1949年1月,刘亚楼来到海河之畔,任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,指挥东西两路大军会师金汤桥,解放天津。

乌江水90年湍流不息,红色古渡也见证着时代变迁。临近江界河渡口的瓮安港云中港去年12月开港。

站在岸边,只见桥式起重机的集装箱吊上货船,汽笛声响起,船顺着乌江驶向下游。过去加工成磷肥的磷矿石,如今经过多道工序变成磷酸铁锂走进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舱。

90多年前,红军乘竹筏渡过乌江;今天,满载货物的船只沿江而下,驶向更远的地方。江还是那条江,渡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守江的人,依然在船上。

遵义会议: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

蒋建农

遵义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。在遵义会议及系列相关会议中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,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
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简单孤立的会议,伟大转折更是一蹴而就的结论。理解这一伟大转折,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遵义会议本身。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后,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指挥,一路处于被动局面。从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的不断酝酿和准备,到遵义会议实现历史性突破,再到“鸡鸣三省会议”、扎西会议、苟坝会议等会议继续贯彻,伟大转折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错误、纠正错误,在实践中重新找到正确道路的过程。

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,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。其意义是打破了长征开始前的李德、博古等“三人团”的独断

重新出发的深切体会。

在苟坝会议上,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,负责全权指挥军事。党的军事领导体制由此进一步完善。

如果把这一段历史连起来看,就会发现,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:

通道会议开始打破军事决策上的僵化和专断;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变既定战略方向;猴场会议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集体领导;遵义会议集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,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危急关头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;此后的“鸡鸣三省会议”、扎西会议、苟坝会议等会议,又把遵义会议开启的转折继续向前推进。

由此可见,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,不仅因为它纠正了一次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,更重要的是,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更加成熟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,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领导方式和思想方法。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革命中闯过难关,在一次次实践检验中校正航向,并由此真正走向成熟、走向新的胜利。

(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)



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